

从笔记小说看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

王日根

科举制度自创立之后,越来越走向制度化,考试的各个环节、程序逐渐严密起来,由于竞争更加激烈,人们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,各种加诸科举考试之中的神灵观获得了存在乃至大行其道的空间。

一、考中的外在因素

考试能否得中,除了考生的实际水平之外,还有许多因素在发生作用。有时一些外部因素也是决定性的。如贞元十二年(796),李程应举,试《日五色赋》。第一场试杂文后,主司已经判他落第。杨於陵看了李程文章后,亲自面见主司,主司乃将李程擢为状元。^[1]举子因得名人知赏,落而复第,可谓侥幸得很。唐文宗时,牛僧孺为相,赏识举子许道敏“文学精臻”,亲自向主司推荐,得到主司应允。不料牛罢相出任地方官,主司遂不敢录取许道敏。^[2]这是由于推荐人的境遇变了,不幸落第。同卷又载:大中八年(854),颜标应举。主司郑薰以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后人。当时藩镇常有乱事,郑薰“志在激劝忠烈”,于是以颜标为状元。后来才知道,颜标与颜真卿毫无关系。(同上)这是由于主司的误会,侥幸得第。大中九年(855),罗洙与韩洙同应举。韩洙与主司沈询为中表亲。沈询在录取时,将韩洙列为第七名。谁知填写榜文时,竟误写为罗洙。一个小小的失误,使本已录取的韩洙落第,同时却使本未录取的罗洙登第。以上事例说明,士人在科场上的命运受到偶然因素的捉弄。此类事虽然少见,但在表明士人不能把握个人命运上,却具有典型的意义。韩愈《杂说四》说: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科场上举子与主司的关系,也就是马与伯乐的关系。由于主司未必有知人之明,由于科场舞弊严重,故才士难得知赏。实际上,士不遇时及不遇人,乃是古代大多数士人的共同命运,科举制下也不例外。不少士人因而一面钻营,一面祈求侥幸。

唐代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科第的神异传说。

《登科记考》言之凿凿:贞元十年,豆卢署,本名辅真,旅居衢州。刺史郑式瞻建议他将二名改为单名,并书写“署、著、助”三字供他选择。当晚,他梦见有老夫要他选“四”字头者为名,并预言他四举以后及第,20年后为衢州刺史。醒来,他改名“署”。后来遭遇果然一一如梦中老夫所言。乃于所梦之地建“征梦亭”。^[3]贞元十八年,樊阳源,初名源阳,夜梦当改阳源才能及第。他改名后,果如所愿。^[4]以上二例,皆因梦改名得第。实际的意义是说明及第与否,偶然性很大。贞元二年,李俊应举。深夜五更时,他见冥吏送进士名册,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,于是哀求冥吏,将册上“李温”改为“李俊”。他遂于当年及第。^[5]元和五年,陈彦博应举。他梦见上奏天帝的进士名册上有自己的名字。陈果然当年及第。^[6]以上二例,说明功名乃冥定。元和七年,李固言应举。他曾得柳神许以及第,结果名列榜首。^[7]长庆元年,本年钱徽知举,皇甫弘自知无望,于是返回家乡。归途中,他在梦中求得石婆神应允助其及第,乃又进京赶考。钱徽本来决定不取他。临写榜时,一时不知取谁为好。于是命人取一份文卷来看,打开来,竟是皇甫弘的。钱感叹道:“此定于天也!”^[8]以上二例,皆是得神助及第。后一例,竟是靠神力改变了考官的主意。

在以上种种传说中,当事人的命运,不管是冥中注定,还是鬼神助成,都与学业无关。这是科举不公的曲折反映,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。表面上看,冥定或神助,是命运使然。但冥中如何注定,以及是否能得神助,人们并不知道。这就诱发了企求侥幸的心理。实际上,上述离奇故事,就是此种侥幸心理的产物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42回《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》^[9]详细描述了乡试的过程:主考官在“贡院前先放三个炮,把栅栏子开了;又放三个炮,把大门开了;又放三个炮,把龙门开了;共放九个大炮。……放过了炮,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。应天府尹

作者简介:王日根,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,兼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、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教授,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、海洋史(厦门 361005)

大人戴着璞头,穿着蟒袍,行过了礼。立起身来,把两把遮阳遮着脸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,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。放开遮阳,大人又行过礼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主试。请魁星老爷来放光。……请过了文昌,大人朝上又打三恭,书办就跪请各举子的功德父母。……每号门前还有一面红旗,底下还有一面黑旗。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;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。到这时候,大人上了公座坐了。书办点道:‘恩鬼进,怨鬼进。’两边齐烧纸钱,只见一阵阴风,飒飒的响,滚了进来,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”

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,说一严姓子弟是个饱学秀才,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,高声朗诵,忽然一阵微微的风,把蜡烛头吹的乱摇,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来,严世兄定睛一看,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……严姓子弟一急,把号板一拍,那砚台就翻过来,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,把卷子黑了一大块,婊子就不见了。

第四十四回《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》第521页,说到“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,他不曾中,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,只发大房,不发二房,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,终日商议迁坟。”

第2回《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》第23页梅玖说了梦对他的帮助:“正月初一日,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,天上的日头,不差不错,端端正正掉了下来,压在我头上,惊出一身的汗,醒了摸一摸头,就象还有些热。彼时不知甚么原故,如今想来,好不有准。”

同一回中,当周进提到读过王孝廉的朱卷时,王孝廉道出了真实:“那时头场,初九日,天色将晚,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,自己心里疑惑,说:‘我平日笔下最快,今日如何迟了?’正想不出来,不觉瞌睡上来,付着号板打一个盹,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,中间一人,手里拿着一枝大笔,把俺头上点了一点,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,揭帘子进来,把俺拍了一下,说道:‘王公请起。’那时弟吓了一跳,通身冷汗,醒转来,拿笔在手,不知不觉写了出来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,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。”

二、各种心理引导因素的影响

科举之中与不中,实在颇难蠡测,于是迷信风气

应运而生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十三《科第》分《种德》、《立品》、《孝感》、《求签》、《梦》、《鼎甲》、《元》、《异事》、《武科》等九目,以类辑事,所言无非迷信,其中尤著者,又可概括为命相、风水、感应和因果报应等四类。

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记科场事五则:其中一则谓浙江嘉兴有吴生者,儒而兼贾,久已不预场屋。某年乡试,梦其父祖催其入闱,谓彼如不去,场中将缺一孝廉,并教其访同族吴兰陔,索其窗稿“乡人皆好之”一节题文,兰陔为时文名手,而屡困场屋。迨入场应试,题出,为“乡人皆好之”一节。吴生直录兰陔旧作交进,而兰陔因得意之作为人录去,不胜悔恨,“谅天意,终身不得售矣”。遂草草终篇而出。然兰陔是科竞中,而吴生不中。兰陔见座主,以旧作呈阅,谓闱中之作,聊以塞责,不堪为多士寓目,请以旧作易之,座主许之,但说,“虽然,此文若在场中,未必中式。盖阅卷时走马看花,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,此文非反复数周,不知其佳处。试官有此闲情乎?故无益也!”吴生则以为父祖诓骗子孙,怨恨之极,夜复梦其父祖来,怒责之曰:“不肖子,何如?此中自有天命。汝若不抄截兰陔文,彼必自录,又不得中式矣!”生曰:“彼之中与不中,与我何干耶?”父曰:闱中饭食,皆出帑项,非生时注籍,岂易得哉!汝命中尚有一次,不完,总不得安静也!是则即士子的入闱次数,以相信是命中前定事。由于迷信命运,于是问神、占卜、祈梦、算命之风,流行于士者社会。《履园丛话》《科第》类所记,即其明证。

苏州及第者多,这在全国均堪称有名。据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记载,明代自明太祖洪武四年(1371)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(1643)前后243年间,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,苏州共出状元8名,占全国状元总数的8.89%。清代自清世祖顺治三年(1646)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前后260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114名。如果按省划分,依次为江苏49名,浙江20名,安徽9名,山东6名,广西4名,直隶、江西、湖北、福建、广东各3名,湖南、贵州、满洲各2名,顺天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蒙古各1名,而吴地即今苏州所辖区域出状元26名。相比之下,其人数以明显的优势超过其他省份,占有清一代全国状元总数的22.81%,占江苏全省状元总数的53.06%。状元与科考人才辈出,必有其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人文的种种因素。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在《苏州史志笔记》里将之归结于“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

弟适应科举制度的才能,其技术在全国为最高。”然而,在明清以前的南宋时,范成大在其所撰的《吴郡志》卷四十四中,却将之归结为被应验了的二讖:“吴郡,自隋唐设进士科以来,未尝有魁天下者。比年,父老相传二讖:一曰:‘穹窿石移,状元来归’。一曰‘潮过夷亭出状元’。淳熙初,穹窿山中一夕闻风雨声,诘朝,视山半有大石,自东徙西,屹立如植,所过划犹偃。辛丑科,吴县人黄子由遂状元及第。夷亭在昆山县西三十五里,昆山虽近江海,自古无潮汐。绍兴中,始有潮至县郭。至是,潮急大至,遥过夷亭,李彦平侍御亲见一道人,复诵此讖。谓宜有人应之,乃以告知县,叶自强作问潮馆于水滨,甲辰科,昆山人卫泾清叔亦为状元,黄、卫相继两举,天下传为奇事。”

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讖谣。苏州摘擷科考之冠乃是明清时的事。在南宋以前,远不是如明清时那样独步天下的。二讖——“穹窿石移”和“潮过夷亭”——分别作为“状元来归”和“出状元”的前提,这种预设的事件,本都是在实践中不能实现的事,然而都匪夷所思地实现了。于是在当时就有姓黄的和姓卫的分别中了状元。或许,这两个人的高中只是个小验,而作为已实现了的两个讖谣,在南宋时修撰的地方志书里留下记载无疑更要接受后世的大验,令人不解的是,这些都应验了。

后世苏州那里连科擢魁,以至父子高中、祖孙三代高中甚至五子登科的盛事似乎又是为此做了注脚。然而,将之归之那两个“穹窿石移”和“潮过夷亭”的自然现象所致,也总觉勉强。然而,这记载又毕竟是南宋时确凿地留下的,可以肯定地是,范成大修撰《吴郡志》时,是不会知道明清时吴地在科考上是有那么股子疯狂劲的。《吴门表隐》中记载着苏州的钱启在乾隆年间从县试、府试到学院和科试再接着到乡试、会试、殿试,六中皆元。一路考过去,都是考第一。一个叫吴廷楨的“少试有司,二十三次皆第一”。在这种科考中元的狂潮面前,状元宰相,吴门四家;五子登科,吴门两家;道光十二年,更是发生一岁竟同郡三元的盛事:状元、会元、解元都为吴人获得。^[10]

在福建福州永福县有一座瑞云峰,当地流传这样的讖语:“天宝石移,瑞云来期,龙爪花红,状元西东。”宋乾道间,果然发生了“崖石横山西行,喘地成溪。既而此石松上复生龙爪花”的自然变化,“是年萧国梁魁天下,郑侨、黄定继之。萧居冲峰,郑居

龟岭,黄居龙屿。当时诗云:‘冲峰龟岭与龙屿,三处山川壮矣哉,相去其间只百里,七年三度状元来。’”这一传说丝毫不亚于苏州的那一则讖语。

福建同安有一个叫“铜鱼池”的地方,人们把它与科举联系起来,编成这样一个传说:如果科举那年铜鱼池水深,那么同安当年肯定会出进士,康熙《同安县志》记载说:“邑中科第,全视铜鱼显晦以卜盛衰。”因为有这样一个传说,所以同安城名铜鱼城,门为铜鱼门,桥名铜鱼桥,馆为铜鱼馆。据说这个名字来源于同安南门桥头的三块大石头,这三块大石头,是古同安(包括现厦门、金门等地)文明的象征,这三块石头形状很像鱼,颜色呈古铜色,当池中水深时,“铜鱼”在池中若隐若现,仿佛互相追逐嬉戏,栩栩如生。南宋绍光二十三年(1153)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为三块石头取名“铜鱼”。传说有时也可成为激励士子应科举的力量。在福建德化,人们也传说着当地美山上有一龟形石,只要这年龟形石“自鸣”,当地就一定有人登第,宋庆元时有黄奎,嘉泰时有黄龟朋,雍正丁未又有邓启元中榜眼。^[11]

有的人相信祈梦,譬如民间有这样的传说:有一富翁一直为儿子屡试不第感到抬不起头,他先是给儿子捐了一个监生,接着便找时机让儿子进考场交个好运,谋得一个实在的功名。有一年考期已近,该富翁想起让儿子去邻村庙里托梦,儿子贪玩,却给错过了时间。回到家里,富翁问儿子托到什么好梦,儿子随便说到“梦见蓝屋坪,有人铲草皮”,迷信的富翁寻思,这大概是说儿子此次应考仍然不会取中,蓝字去掉草字头,显然还是一个监生而已,于是他觉得何必费这份心呢?

《闽杂记》中还有多条类似的记载,譬如雍正癸卯恩科乡试中,泰宁县的廖学信刚走出考场,就对别人说:“今科我必中解元”,当时人有的还耻笑他,榜发后确实如此。廖学信说他三场试所坐的号舍的墙壁上,有两行字,分别是“今科解元坐此?”“其信然耶?”其中刚好有个“信”字,或许正是这种附会,使他在考场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又譬如莆田考生郭兰石安家嘉庆丁卯科乡试,他回忆起先时曾祈梦于九仙祠,梦仙书:“提灯聊玩”四字,当时他没有明白什么意思,揭榜前夜就把这四字写在灯笼上,偶然的是每个字都被烧掉了一半,留下了“是丁解元”四字,榜发又确实如此。无论如何,能够编出如此奇巧的说法,着实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功名得中的无限企求。

士人的命运,因科场成败而有鱼龙之别,故士人莫不巴望春闱得意。然及第与否,常系于偶然。

三、鬼神对考试的影响

犹如举子们以请托、钻营、行卷求助于考官或显贵一样,这类故事所反映的,是举子们求助于鬼神。上苍茫茫,鬼神杳杳,要求助不是很难吗?这较之于求助权贵不是很靠不住吗?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。另一面则是:权贵不是容易求的;至于上苍和鬼神则随时随地可求。所以,侥幸和迷信之风不过是奔竞之风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罢了。

迷信和侥幸心理为方术之士提供了生存土壤。元和七年,李固言应举。他曾遇见一位胡卢先生,预言他将及第并显达。后遇一僧,也作了同样预言。李果然进士及第,后来仕至宰相。^[12]长庆元年,李臚应举。有术士为他卜运,预言他将及第,并在显达以后改名。李果然及第,并仕至宰相,武宗即位后,因武宗名臚,为避讳,改名回。^[13]以上二例,都说明方术灵验。这自然要吸引举子们争相预卜前程。宋代此风愈烈。程颐说:“古者卜筮,将以决疑也。今之卜筮则不然,计其命之穷通,校其身之达否矣。”^[14]《东轩笔录》卷十一云:宋时,“士大夫无不作卦影”。这样一来,就出现了“卖卦者唯利举场时”的社会现象。^[15]至于求神拜佛就更热闹了。《夷坚志》丁卷八《陈尧咨梦》谓:“每当科举岁,士人祈祷,赴之如织”。自宋至清,为功名事算命及拜佛之风,一直盛行不衰。

此外,人们还迷信风水。明清时期,为选择葬地,数年甚至数十年不葬亲者颇多。史载:邵宝任江西提学副使时,因当地颇多数十年不葬父母者,特规定士人不葬亲的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^[16]清康熙时,刑部尚书徐乾学指出:虽有法律禁止久丧不葬,可是“世人往往犯之”。^[17]乾隆时,江西按察使欧阳永琦奏请定出葬期,如超过守灵期27个月不葬不得参加科举考试,可是这些措施,并不能发生效力。《儒林外史》第44回叙述当时风气:“人家因寻地艰难,每每耽误着先人不能就葬。”譬如施御史兄弟,老大中进士,做御史,老二没有中,就说是“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,只发大房,不发小房。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,终日商议迁坟”。第45回描写余殷自吹他选的葬地:“我这地要出个状元。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!”余敷帮腔:“就要发!并不等三年五年!”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大学士李光地请假

回原籍葬母及妻。因为选择吉地及吉日,前后历时三年,才办完葬事。清同治元年(1862),浙江按察使段光清请假回乡葬亲,也是由于选择葬地及葬日,历两年才完事。诚如《儒林外史》第44回中正直士人迟衡山所感叹的:“士君子惑于龙穴,沙水之说,自心里要发达,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!”这是说为了功名富贵,士人竟连孝道都不顾了。

明代上海浦东陆深的乡试高中中有牡丹神话:传说青年陆深书房门外有一株牡丹,每年开花仅数朵而已,但到了弘治十四年(1501)辛酉的春天,这株牡丹竟然开花有百把朵之多,并且每朵花都异常的鲜艳,该年秋天,陆深至南京参加乡试,终于高中为解元。

潘恩家族有“种德食报”之说:潘恩之父潘奎,当他任松江府都椽时,正遇着一位严厉御下的松江郡守,其时潘奎住处附近有一个残暴不仁的土豪,往往鞭撻奴仆体无完肤,甚至丧命,并经常地冤杀奴仆。潘奎冒着被太守责打的危险,大胆地向太守陈述了那个土豪的种种不法劣迹和奴仆们的枉屈,太守听取潘奎陈述后进行了调查,果然情况属实,乃捕土豪下狱治罪,尽释了以前被那土豪枉送进狱的无辜奴仆。“有德者必有后”,一年之后潘奎果然有了做到左都御史的侄儿潘恩。

因为迷信命运,于是问神、占卜、祈梦、算命之风流行于当时的士林社会。从唐代开始,科举制兴起,看相行业得到巨大发展。《太平广记》记曰:“唐东市铁行,有范生,卜举人连中成败,每卦一缣,秀才郑群玉短于呈试,家寄海滨,颇有生涯,献赋之来,下视同辈,意在必取,仆马鲜华。遂赍缣三千,并江南所出,诣范生。范喜于异礼,卦成,乃曰:‘秀才万全矣。’群玉之气益高。比入试,又多赍珍品,烹之坐享。以至继烛,见诸会赋,多有写净者,乃步于庭曰:‘吾今下笔,一字不得生,铁行范生,须一打二十!’突明,竟掣白而去。”^[18]长安的东市是有名的市场,范生在市场的铁行设座卖卜,每次一缣,价格不菲,可见其市场不小。连柳宗元应试前亦曾在长安问过卜。柳宗元是贞元五年(789)到长安,贞元九年(793)春进士登第,考了四回,“依违迁就,四进而获。”当一位姓蔡的秀才下第回家,柳宗元都用“定数”来安慰,可见科举考试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,占卜由此也就有了市场。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:“元和中,(孟)简将试,谓日者卜之,曰:‘近东门坐,即得之矣。’既入,即坐西廊,迫晚,忽得疾,邻座请与

终篇,见其姓,即东门也。乃擢上第。”^[19]张曙、崔昭纬中和初同举,相与诣日者问命。曙时自负才命藉甚,以为将来状元,崔亦分居其下,日者殊不顾曙,第目崔曰:‘将来万全高第。’曙有愠色,日者曰:‘郎君亦及第,然须待崔拜相,当此时过堂。’继而曙果不终场,昭纬首冠……后七年,昭纬为相,曙方登第,果于昭纬下过堂。”^[20]又譬如“李相国揆,以进士调集在京师,闻宣平坊王生善《易》筮,往问之,揆时持一缣晨往,生为之开卦曰:‘君非文字之选乎?当得河南道一尉。’揆负才华,不宜为此,色悒忿而去,王生曰:‘君无怏怏,自此数月,当为左拾遗,前事固不可涯也。’揆怒未解。生曰:‘若果然,幸一枉驾。’揆以书判不中第,补汴州陈留尉,始以王生之言为征,后诣之。”^[21]

北宋沈括说开封“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,时举人占得失,取之各有术。有求目下之利者,凡有人问,皆曰必得。士人乐得所欲,竟往问之。有邀以后之利者,凡有人问,悉曰不得。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,皆以谓术精而言直,后举倍获,有因此著名,终身隍利者。”^[22]开封卖卜者主要是做举场的生意,卜者揣摩举子的心理,拣其乐意听者而答之。

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一三《科第》说:清初华亭王广心家族的子孙昌盛,科甲蝉联,与其精通“青鸟术”,善于选择风水宝地做祖坟有关。^[23]由于迷信风水,故当时有迟葬、迁葬等陋习。诸联《明斋小识》卷四《迁莹》条曰“娄县盛邦直,精堪舆土遁术,谓其上世封茔不吉,改窆于吾邑刘夏镇。葬后墓中有声如蝉。久而年歇,至甲午,子麟中式,戊申,侄莲又中式。”

人们还编出各种口诀来提高应试的信心。如“甲巳乙午报君知,丙戌申官丁己鸡,庚猪辛鼠壬逢虎,癸人见兔入云梯。”如去年甲戌生人,其八字中有巳(蛇),今年乙亥年生人,其八字中有午(马)。即是文昌星座,主聪明才智过人,昔年重视科举,凡命中有文昌星即必增加信心,前去赶考。如果某人今年阴历五月生子,自一定有文昌星座。如果其生日也有午字,这是双重文昌星,一定高中魁元,大捷天下,有状元之命。^[24]

为了求得好的兆头,学童入学往往举行破学仪式。新入学的学童,准备熟鸡蛋二枚,另备四支细竹管,其中一管用一条灯心穿透,另外还须几支青葱和几条芹菜。举行破学仪式时,新生面向壁上的“五文昌夫子神位”双足成八字形站立,此时村学究把两

粒熟鸡蛋由学童背后胯下掷过去,同时口中念道:“混沌乾坤两把开,聪明领悟一齐来。”然后学童向神位行三跪五叩头的大礼。再烧金纸放鞭炮,所以初入学的学童应备果合、蓼花、糖饼等礼品以及香金烛炮,以作对“五文昌夫子神位”之敬礼,因新生有“破学”这个仪式,故须加备熟蛋二枚,旧生则免。而所带来的竹管、葱、芹等物,供奉香案桌上,因葱谐音“聪”,芹谐音“勤”,以励学子聪明勤奋,而灯心穿透竹管,则寓“一以贯之”,亦含“通透”之意,均为美好愿望之象征。

科举行业中还拥有了自己专门的行业神——文昌帝君。许多士子平时或应试前往往都要祭拜文昌帝,也有的拜文庙,祭孔子。表现出极度的虔诚。如今,有的应高考的考生也祭拜各类的神灵,都是为了谋求心理上自信的树立。有些庙宇祭祀“五文昌”,包括魁星爷、朱衣神君、纯阳子吕洞宾、文昌帝和文衡圣帝关公。它们共司礼文制度,成为保佑考试及格而有求必应的神。据说,“魁星”就是“魁斗星”,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,即廿八宿中的奎星,也被称作魁星或魁首。读书人相信魁星爷和榜上题名有关,故常于七夕日祭祀它,平时也常向它祈福。虽然有些传说把魁星描绘成一个麻子,且外貌特别丑恶,但读书人却奉之为神,敬之不疑。清朝时,福建的读书人在七夕之日买来青蛙放生,以祭拜魁星,据说是因为古代“奎”与“蛙”相通,民间就以置蛙放生来祝贺其生日,并且戒食青蛙以示尊敬。

台湾祭拜魁星也以犬或羊来祭拜,称为魁星会,这是因为取其角之谐音,以为高中的吉祥前兆。据说,魁星高中与科举放榜的方式有一定联系。科举考试成绩揭晓和填榜时,其方式乃是拆一名、唱一名和填一名,从第六名倒回揭晓,一直填到最后的一名的“孙山”。然后再从头开始宣布前五名的高中者,这前五名就叫作“五魁”,第一名的状元就叫“魁首”。清陈尉在《台湾竹枝词》中有“家家杀狗祭魁星”的句子。

在浙江海宁,上梁时有吟诗的习俗,有的诗也有祈求科举及第的内容。如“脚踏云梯步步高,新造高厅接云霄,上梯一步高一步,下梯步步后来高。小姐要上绣花楼,官人要上读书厅。读得书来识得字,三鼎格里中头名。”科举及第已经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万历壬子年,山东举行乡试,济南盛传童谣道:“三人两子,太阳离岛”,指徐海曙,子日升。清人褚

人获《坚瓠集》武进人翟海槎，字永龄，欲赴南京赶考，由于缺乏盘缠，便买枣数十斗，每次经过街市，便呼群童至，分给每个人一捧枣子，让他们沿街喊道：“不要轻，不要轻，今年解元翟永龄。”结果童谣满街，闻者信以为真，急往翟氏所居客房拜访，并纷纷买其枣，翟氏以此大获其利，同时也为自己作了宣传，可见士子举人利用谣讖自我标榜，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风气。

清代考场命运决定论盛行。通常情况下，参加县级童试的人数逾千人，参加省里乡试的人数几千乃至上万人。文风昌盛的江南自不必说，即湖北黄冈县也是“童子试且数千”^[29]。判卷官员人数少，卷子多，即使排除官场腐败因素，也难以做到真正公平客观，这成为“功名命定”说盛行的基础。曾有一位江苏学政以阅卷“快短明”著称。清人薛福成这样描述道：“今之督学使者，按临各郡考试生童，每次须分十余场，往往因公事繁冗，期限迫促，不能从容评阅，悉心搜校。……江苏为人文渊薮，闻昔学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，大抵交卷愈快愈妙，篇幅愈短愈妙，而意义则取其明白轩爽。题纸一下，不可构思，振笔疾书，奔往交卷，取额一满，则不待终场而出案。”据说有一次，考试文题为“山梁雌雉”。有一个考生卷中仅十六字，曰“春秋绝笔，西狩获麟，乡党终篇，山梁雌雉。”这份考卷，竟被取为第一名。更有戏剧性的是福建闽县人陈若霖，他早年一再为童试所困，直到28岁还未考中生员，乃决意辍举业为商，结伴同往苏州贩布。陈若霖已经登上驶往苏州的商船，然而船为风所阻，连续多日未能起航。当他在船上等待风向转变时，“忽见岸上急足到，为公进家信云：昨学辕牌示，即于日内赶办科考，嘱公速回应试。公笑曰：此所谓蛇足也。漠不为意。其同伴皆促之回，亦不动，乃数人掖公上岸，将行李抛至路旁。时风已转，径扬帆去。公不得已，怏怏入城，旬日间遂入学。是为乾隆丙午科，九月举于乡，次年三月成进士，入翰林”^[26]。福建侯官郭氏家族笃信“宅运”之说。郭氏族人到北京应试，有一次住在“南半截胡同”旧宅。鹿泉公（郭溶）居之，同乡许柳丞水部亦居之，皆屡蹶场屋。潘耀如丈不与文衡，亦归咎于宅运。光绪丙戌，诸叔计偕入都，文安公（郭曾忻）拟于院近赁禅寺为安砚地。诸叔不信其说，仍下榻寓斋，是科俱落第。次科己丑，已移居宣武门大街，而南云叔（郭曾程）吹闹获隼。又次科壬辰，少莱叔（郭曾准）亦成进士入翰林。虽适然相值，而宅运之

说，固未可尽废。^[27]

是什么因素决定是否能取中，历代科场中人、科场外人在长期的历练和观察中似已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看法，形成俗谚并流传下来，确可资我们分析。譬如“窗下莫言命，场中莫论文”。^[28]这是告诫应试者应正确对待平时的学习和考试。在平时学习时应立足于认真读书，认真准备，进入考场后，就不必恃才自傲，而应该放松心情，依平常的积累发挥，至于能否取中，可能就牵涉到考官的判卷观点差异，佳卷也不一定都能被录取，所以要有正确的态度。确实考场的一举也不完全反映平时学习的成果，有时偶然因素也至关重要。又有谚语说：“场中莫论文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功五读书。”^[29]唐彪说：“夫功名之得失，命实主之，不系文章也。”^[30]唐时也说：“霍渭崖为主考，人问场中好尚如何，曰：尚命。命好而文好，应有收好文章者，命好而文歪，应有收歪文章者，命歪者，则反是，人皆服其真确，余谓此犹未尽中利病，即使十六七双眼睛，皆取好文章，其取舍亦尚不一，即渭崖取其所取之文，而重阅之，其取舍亦当不同，又孰从而揣之乎，功名之道，天人与我，三者鼎足用事，又何从而断之乎。”^[31]

许仲元说，科场遇合，变幻百端，偶然性很大，如有鬼神。唐宋以来，记载很多，鬼神弄人，若可解，若不可解，他自己九试棘闹，终于白蜡，而其弟丁未游庠，乙酉即领乡荐，其卷二三篇有漏下语，诗复失粘，“予谒副座师贺虚斋先生及本房谭武述大经，均言闹中但觉其文从字顺而已。稷堂夫子言甲午分房，八日抄荐卷已足，一夕欹枕间，辗转如芒刺在背，乃起独酌。忽得刘泰卷，颇赏其老洁，然因太质，仍置之，乍解衣，闻箱中低声谡谡，仆从皆闻，谓开箱时，有鼠窜入也，乃取刘卷再阅，字字惬意，明晨遂荐之。榜发后，复阅之，平平耳。”^[32]

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记载：“壬辰，予与胡道南、沈禹玉会试，予语道南云，参乎全章题，曾揣摩否，时已二月初六矣，道南晚作此题，止三百余字，同人取阅，而禹玉独注目多时，予谑之曰：‘君欲抄其文耶？何阅之久也。’予与道南、禹玉卷，俱在王公舜年房，道南中式，禹玉已得复失，阅其落卷，即次题参乎全章抄道南作，因雷同而黜，道南初谒房师，即云两卷俱好，惜二题重复，郑房李公云：‘何不两弃？’王公云：‘必中其一，心乃安。’李为拈阄，乃得胡而弃沈。”录取结果靠拈阄，却也侥幸判中，即始作者取，抄袭者黜。^[33]

既然有种种偶然，考生在考前就不能不苦读，考后就不能不听命，即所谓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。科场险恶，确实玄机随处可见，有的人注意积德，注意阴功。查晚清《科名显报》一书，其记因善报得中的德行包括：孝亲、友爱兄弟、为民讼冤、善处夫妇、保全人骨肉、全人妇媳、善成人婚姻、全人节、存日孤、救人于灾难、救人于溺、还人金、捐赈施粥、施棺助葬、周急济困、修塘筑堤修路、养弃婴、惜字、放生、全活物命、尊师重道等。^[34]因恶报而黜落的恶行包括：不能孝亲、不从父子兄弟上料理、仅守文字、不善处夫妇、宿娼、私起淫心、坏人名节、图人之财、坏人节义、诬人名节、代写离书、好谈人闺闻、忍心溺女、背师忘恩、不能谦谨、为恶人讼、忌妒害人、诱赌好赌、受贿、不尊善书等。此种如有鬼神在的普遍信念，对于维系世道人心有着积极的意义。《科场显报》分别记录了一个善报例和一个恶报例，对人们的行为取向颇具引导意义。有一例叫“场外举人”：“句容某生，乡试已买卷校名，寄寓地藏庵，闻有姑因子出外十多年，不得不让媳另嫁而悲泣，即诡为其子作家书，并寄银十两，而该生以无金，不得不束装归。而此年又正好某抚军作监临，布政作监试，戏谓弃时文已久，不知尚能与诸生角艺否，于是以点名不到卷发誉，以试两主考法眼何如，至揭晓日，中第二名举人则句容某生也。后正好上述姑之子归而求禀缙恩人，抚军明真相，曰：‘如此阳德，获中宜也’，遂让其中举。”另有一例是：余姚邵某贪贿而假言一妇不贞而致其死，丁未场会试二场梦中得论表题，即做好表藏笔管内却被查出，时监试之一为贵阳李时华，系举人出身，邵辨曰举人即不中进士也有官做，岂肯怀挟？李闻大怒，责三十板，另一进士出身监试叶永盛欲免题奏，李曰“先生是进士官不怕事，我是举人官，胆小不敢不题奏。”具疏上闻，邵被褫革遣戍，抑郁而死。

在中国古代那些浸润于孔孟之道中的士人当中，道德人生是高擎于手中的旗帜：人一生一世，不仅要考虑人的外在状态，更要考虑立身行己的根基。“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“好男不吃分家饭，好女不穿嫁衣裳。”等等都与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四。
- [2]《登科记考》卷二十二。
- [3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三。
- [4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五。
- [5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二。
- [6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八。
- [7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八。
- [8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九。
- [9]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8 月版，1988 年第 4 次印刷第 496—498 页。
- [10] 吴恩培.文化的争夺[M].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1.
- [11]施鸿保.闽杂记卷六[M].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5.99.
- [12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八。
- [13]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九。
- [14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五《畅潜道录》。
- [15]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七十三《诈妄谬误卜者》。
- [16]《明史·邵宝传》。
- [17]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卷六十三《亲丧不葬》。
- [18]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六一《郑群玉》条。
- [19]《唐诗纪事》卷四十一《孟简》。
- [20]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六《张曙》。
- [21] 傅璇琮.唐代科举与文学[M].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2.460.
- [22]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二。
- [23]潘光旦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说浙江海宁陈家也存在这种情况。
- [24] 王尔敏.明清庶民文化生活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02.116.
- [25]光绪《黄冈县志》卷二。
- [26]民国《螺江陈氏家谱》《文诚公轶事三则》。
- [27]郭则澐《旧德述闻》卷五.清代朱卷集成(89),第5-6页.
- [28]文康.儿女英雄传(下)[M].齐鲁书社,1989.780.
- [29] 钟毓龙.科场回忆录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7.73.
- [30] 唐彪.读书作文谱[M].长沙岳麓书社,1989.14.
- [31]《尺牘新钞》卷七“与袁州平书”。
- [32]许仲元《三异笔谈》,《笔记小说大观》十册,第467页.
- [33] 俞樾《茶香室续钞》卷十。
- [34]《科场显报》第24—25页。

(责任编辑:滑文革)